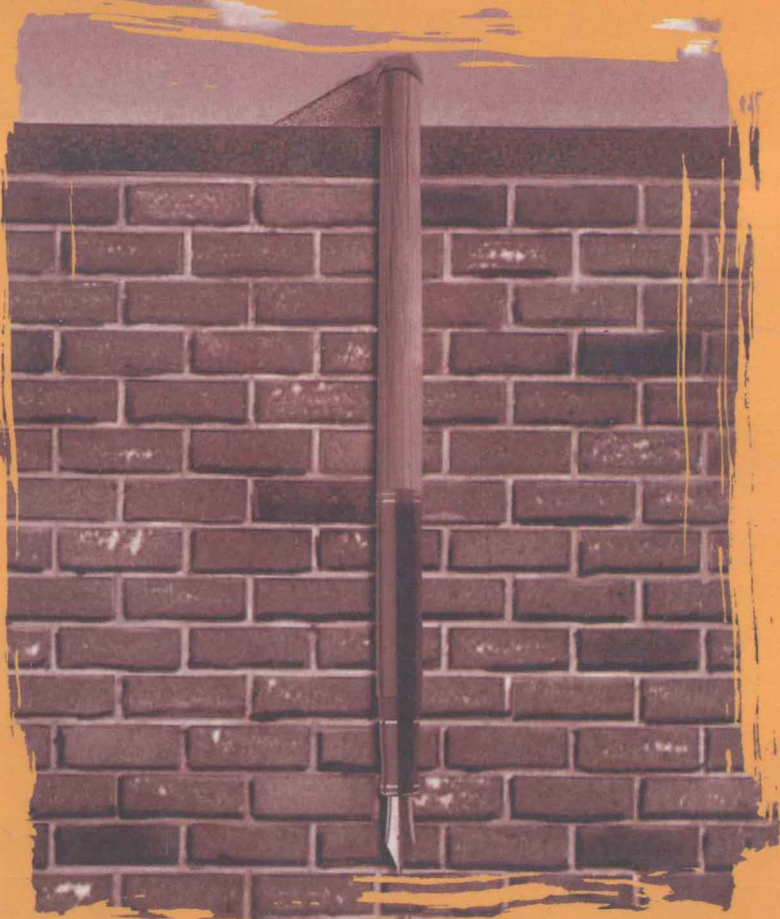


李国文

小说精选

“从
头
越”

名家小说精品文库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国文 精 选



李国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成都

精 品 文 库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王华光

封面设计：廖新松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伍登富

“从头越”名家小说精品文库

李国文小说精选

李国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6.75 字数 370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495-X/I·699 印数：1-8000

定价：21.00 元

常青的树 开不败的花

——“从头越”小说文库序

崔道怡

当代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谁不熟知他们的名字，谁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呢？他们的书，二十年来，早已多次被这样、那样编辑、出版过了。而今，之所以把他们重新集结起来，是因为选取了“从头越”这么一个令人遐想的视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写长征的词句，但它也涵概了历史与人生的一种境界。这十位有着特殊历史与人生历程的作家，各以其感受“雄关”之“铁”而后再“从头越”的体味，展现了这种境界的苦难与辉煌。个中滋味，是非亲历者所想象不出、所感受不到的……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当此时机，新中国第一批新作家展现才华，捧出了在当时曾引发巨大反响的锦绣篇章。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从维熙的《并不愉快

的故事》……相继使人耳目一新，真个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但是，1957年5月15日，发动了“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又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7月1日，他进一步指出：“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随即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疾风暴雨横扫大地，“百花齐放”顷刻凋残。当初在“整风”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遭遇到大劫难。反右派扩大化，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打下深渊。一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的作家，被劳改，被流放，甚至被关进了“大墙”。

天昏地暗，犹如月食。但天然月食，为时暂短，这一批“右派”作家的人生“月食”，却长达二十二年。“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李国文平反后又二十多年，在其随笔里《如此这般》回首往事，传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痛苦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虚度过去……”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我国文人历来就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传统，他们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坎坷摔打铮铮铁骨，苦难磨砺琅琅文情。这一批作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立即复出，如泉喷涌，再次展现他们非同凡响的才智。仿佛是挤压于岩层中的古莲子，一旦重逢空气和水，便能照样绽开荷花，亭亭净植，香远益清。

事实上，早在改正前夕，王蒙就已创作了他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最宝贵的》；李国文就已构思了他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从那时起，直到如今，二十年间，姚黄魏紫，他们各有文集出版，平均每人三五百万精美文字流传于世。现在，我们把他们搜集起来，再次选优拔萃，更加精益求精，便会在总体上生发出异乎寻常、无可替代的社会与文学的认识作用、审美功能。

这一套文库，使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得到：跨过了“真如铁”的“雄关”，“而今迈步从头越”之后，这一批作家被积压了二十年的才华，不仅没有稍减，而且愈发锐利深沉。似乎是要对那“虚度”的岁月加倍地补偿，他们把青春年华的美与力储备着，汇聚到这得以放释能量的复出时期，凝结出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实而瑰丽的贵重中年。这种“从头越”现象本身，就是历史转折的出色见证，就是人生跟进的超常景观。

总览十位作家近二十年这一系列代表性的著名篇章，我们能够再次采取他们彼此之间不约而同的相通之点。那就是：他们与人民同心，他们与历史同行。四十多年前，他们的蒙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以作品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平反二十年，他们的创造，依然以为国为民、忧国忧民为主旨，对思想解放、改革开

放，起到了启蒙鼓劲、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而那一篇篇洋溢时代气息、饱含生活情理的精神产品，又正是我国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改革开放进程的画卷。

但他们又是各不相同的。在艺术特色上，论风格与流派，他们原就各有千秋；“从头越”后，又各有创新，发挥与发展了各自的专长：或以呼唤先锋新人耳目，或以倾心乡土引人关注，或以扩展题材别开生面，或以创建文体独具一格，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各领风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聚会一处，他们又结为璀璨星座，构成了新时期文坛上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正是这种有所相通又大不相同的艺术创造，使得他们相继不断走上各种各样文学评选的领奖台，被戏称为新时期第一批“获奖专业群体”。早年致祸之作，又早已作为“重放的鲜花”得到公正评价，二十年来获奖篇章或虽未获奖却同样厚重甚或更有独特风味的作品，无不焕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提出“毒草”概念同时，却也发出预言：“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这一预言，恰恰是在因炮制“毒草”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这里，得到了确定的证实，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那么，我们在“毒草”变香花、“右派”成主力这一个历史的坐标上，编辑、出版这一套“从头越”小说文库，其意图便也应不言而喻。我们相信，历史将进一步证明，我们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作家与作品，总体上是常青的树，是开不败的花。

他是一棵常青树（代序）

——我心目中的李国文

崔道怡

最先见到的是一棵树，一棵高大粗壮而古老遒劲的大槐树。枝叶茂密，浓荫匝地，笼罩了小羊宜宾胡同东头的整个街面。

树北边高台阶，屹立着大门楼，尽管红漆剥落，依然可见老北京阔人家四合院的威严气派。影壁墙上，挂着木牌，写有楷书——人民文学。

1956年夏天，我走进这四合院，从此开始编辑生涯。

或许因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有北大教授兼刊物编委吴组缃先生的举荐，我到任后，见习期间，就被派为京、津、华北地区小说责任编辑。

杂志社前院南房，是传达室、会客室。进垂花门，迎面五间前廊后厦大北房，是编辑部小说组。后花园新盖一排平房，西厢便是我的宿舍。

1957年5月，春光明媚，花树欣荣，院子里飘散着丁香花甜甜的幽香。我搬把椅子坐到前廊，探宝似地披阅来稿。披沙拣金半年有余，至今没能选中一篇理想之作，心中未免有些焦躁。

正当无奈之际，眼前豁然一亮，我在一摞自然来稿之中，发现一组令人醒目的作品。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在刻蜡版；更改处不涂抹，另剪稿纸，贴补起来。我头回见作者对自己的劳作恁般自重，而且自信：他是把五篇小说一块儿寄来的，想已修炼多年，如今即将出山。

这一位投稿者，就是我当编辑第一个发现的作家——李国文。

二

我之得以轻松自如地在花香中审阅来稿，是因那时中国文坛正当思想有所解放的早春天气。

自从1956年初，秦兆阳接任副主编以来，《人民文学》感受时代风气之先，多次在“编者的话”中表示：“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就在我上班后，刊物同期发出两篇文章——秦兆阳倡导艺术规律的专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蒙揭示现实弊端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一夜春风花千树，万方鼓舞现生机。《人

民文学》走在前列，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之作。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李国文以他那忧国忧民为核心的艺术良知，演化成为出手不凡的精美文字。我犹如探矿者寻找到丰富的宝藏，急切地要发掘更贵重的珍奇，当即写信请他把手头所有成稿悉数寄来，以求集束推出，取得轰动效应。

作为李国文第一批作品的第一个鉴赏人，我至今还记得那六篇小说的名字和大致的内容。它们是：《童心》、《出息》、《邻居》、《巧遇》、《初恋》、《改选》。其中最出色的《改选》，写一名老工人的性格与命运——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现任工会主席为了争取连任，要做一篇精彩报告，“提出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需要的样板。

“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只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做报告”，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后来又因做了这样那样有违上级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则干脆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了。但是，工人们不答应。

“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三千四百二十三张票，“第一名郝

魁山同志，得票数为三千四百零五”，掌声雷动，人们要求老郝讲话，而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痛苦，萎靡地垂下了头”。

“老郝死了！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读过这篇小说，我也“沉静下来”，仿佛置身会场，跟那些工人一样，“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不仅因“老郝”死去，更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鲜活出世，我受到了一股感人警世的情与理的冲击和启迪。

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而有人掌权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毒瘤，派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正是针对这些弊端，《改选》呼唤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呵护珍重。这呼唤当然是艺术的，李国文将所感进行了典型化的提炼加工。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痛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这不正是进行着的“整风”运动所需要的作品题旨么，这不就是我千淘万滤期盼已久的珍贵篇章么？它将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样引人注目，它将使我在编辑历程上迈出的第一步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如期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艾芜等名家荟萃,而赫然排列于前的,是李国文的《改选》。《改选》的终审、编辑部主任李清泉撰写了《编后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朝气的青年们,在各方面都不甘于沉寂和畏缩,在文学战线上也是如此。‘鸣’、‘放’同样鼓舞了新生力量,有不少人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本期所刊载的《改选》、《红豆》,都是新人的作品,希望前辈作家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怀它们的创作。”
“我们始终是在处在一种所谓紧张状态里,一方面在整风,同时也是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策划关于刊物改进问题。”

多么切实的业绩,多么美好的设想。可是,编辑和作家,没有关注到: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向党内干部发出了攸关数十万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8日,毛主席再次发出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7月1日,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表明——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7月9日，毛主席又一次发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同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疾风暴雨横扫大地，“百花齐放”顷刻凋残。当初在“整风”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遭遇到大劫难。反右派扩大化，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打下深渊。

四

迫于形势，《人民文学》不得不在八月号上刊出一封工会工作者的来信，对《改选》进行批评。但那意见却是这样的——

“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很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因

为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

这“批评”竟要求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岂不是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于是，在反右时被看中、成为“左派金棍子”、后升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跳出来“批判”了。《人民文学》七月革新，被指斥为“毒草”专号。对《改选》，另有一位文学界内“懂艺术”的权威人士，“揭露”它思想上“隐含敌意”。在那个各单位按比例抓“右派”的特定年代，对于一名刚出世的年轻业余作者，如此“罪状”足以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的指向，并非仅限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殃及着一大批有知有识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辑和刊物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刊物上，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文章《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意图的。我们看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当代人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

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时就曾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改选》的遭遇，就是明证之一。

如今看来，马前卒所“揭示”的李国文之创作意图，倒也所言不谬。他呼唤珍惜的，正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他暴露贬斥的，正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员领导者”。

这样的题旨，不仅在当时可谓用心良苦，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五

“黑影开始侵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俊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

这是李国文获 1980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

《月食》所写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而李国文所经受的人生“月食”，长达二十二年。

“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疤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

1997 年春，“月食”过后又二十年，李国文应邀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随笔，《如此这般》表白。

既然如此，我又已对《改选》构祸始末作了一些补充，那么似乎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但是我还要说，我要说：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做的。

1979年春，他的冤案获得平反，《人民文学》约他写篇“右派”题材，让人从中能够看到他的影子，以亮相于受难之刊。他说这不好写，他不愿雷同于时下流行的“伤痕”，他不愿只回顾自己个人的苦难。于是，不写“右派”受难，而从平反开篇，专写他去“寻找那些失去的东西”——与人民的联系。

这便是《月食》的题旨，来自他平反后回工地迁户口的旅途上——

“那天正巧赶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艰难历程，感慨系之。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似月食一样黑了又亮了。对我这个人是如此，进一步想，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于是恍然大悟，个人的恩怨在整个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在铁路工地劳改多年是流动性的，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老乡，饿死在三年灾荒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所承受的苦远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点移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上，努力和以前别人写的不同。”（《讲讲小说创作》）

这便是李国文创作的宗旨：当年忧国忧民而写《改选》，现在爱国爱民而写《月食》。《月食》之后以至于今，他的笔触归根到底都是为着国家与人民根本和长远的福祉。所以，无论遭逢怎样的境遇，他都坚守着一个“文”字。